



蒋介石下令枪毙 毛泽东赋诗颂扬

“密使一号”吴石：潜伏台湾的最高特工



翻拍的吴石资料照片。

好友牵线 猛将“锦江”觉醒

吴石 1894 年 8 月出生于福建福州，1915 年投笔从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留学日本炮兵学校，1930 年又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两校毕业时都名列第一，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1934 年进入国民政府工作，一直担任军政要职。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吴石受到了党中央的注意。1938 年 8 月，国民党在武汉珞珈山举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共产党部分领导人也应邀前来授课。吴石作为班主任，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有了直接接触。

能争取到吴石，不能不提到何遂。何、吴两位将军曾在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中共患难，同生死，友谊日笃。何遂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其子女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被称为“情报世家”。他早年参加革命，反对蒋介石政府，以民主人士身份积极为我党奔走。

1947 年春的一天，对国民政府极度失望的吴石找到何遂，希望通过他和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何遂十分了解吴石，见他下了决心，便安排他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在上海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见面。何遂之子何康陪同，他回忆：“他们大概在里面谈了一个小时，出来后便微笑着相互道别，我便知应该是建立了某种联系。”于是，何康成了吴石的单线联系人，吴石为我党工作的序幕正式拉开。

他文武兼备，号称十二能人；他推进解放，协助获取“剿总”情报；他联络同志，促成江防舰队起义；他心系统一，冒死赴台血洒宝岛。他，就是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卓越贡献、1950 年震惊两岸的“吴石案”的主角吴石将军。

决战时刻 密送“剿总”情报

1946 年至 1948 年，吴石受蒋介石任命主持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工作，负责收集编撰军队在抗战中的历史资料。这为他搜集情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成为了决战时刻我地下党组织布下的天罗地网中的重要环扣。

吴石有一位好友叫吴仲禧。他和吴石是老乡，也是保定军校的同学，1937 年 7 月成为中共特别党员，1946 年 9 月，在吴石的推荐和帮助下，出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一职。1947 年 6 月 30 日，我党派出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揭开全国性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吴仲禧也接到地下党组织的任务，要求从华中“剿总”（“剿匪”总司令部）处了解敌方兵力部署情况。

吴仲禧从上海赶到南京后，便在吴石家中住下，结识了来探访吴石的华中“剿总”情报科科长胡宗宪，此人是吴石的学生。因吴仲禧是吴石好友，胡宗宪对他很敬重，并主动提出

寄送“作战态势旬报”，请吴仲禧指点一二，至 1948 年底从未断绝。后经上海地下党组织研判，此“旬报”中包含了国民党部队番号、兵力、军官姓名等，且为一手资料，具有连续性，对我军很有价值。

1948 年 6 月，吴仲禧到徐州“剿总”检查工作。徐州“剿总”参谋长是李树正，也是吴石的学生，一向尊敬吴石。吴石知道吴仲禧在执行“特殊任务”，便亲笔写信给李树正，嘱其照顾安排。李树正对吴仲禧礼遇有加，带他参观了机要作战室等核心场所。吴仲禧将作战室中从商丘到海州国共双方兵力部署情况默记脑海，翌日假借身体不适结束视察，火速返回上海，将这份对淮海战役至关重要的情报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地下党组织。

1948 年底，随着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战场上全面败退，蒋介石紧急将海防第二舰队调入长江，打算以长

江沿岸防御体系做最后顽抗。巧的是，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和吴石是老乡，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一直抱有重振中国海军的远大理想。

林遵看到舰艇装备极差，心里清楚蒋介石就是要他当炮灰，拖住共产党的军队，为国民党高层逃台争取时间。他正在郁闷之际，吴石来访。吴石对林遵推心置腹，两人秉烛夜谈一直到天亮。吴石为林遵认真分析当前局势，并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其考虑。下策是替蒋介石卖命，图个加官晋爵、荣华富贵；中策是学晚清海军提督萨镇冰，保持中立，告老还乡；上策则是率领舰队起义干革命。听了吴石的“三策之论”，林遵坚定了起义决心。

1949 年 4 月 23 日，林遵率领部队在长江下游笆斗山江面起义，毛泽东赞其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林遵的起义军也为后来新中国建立自己的海军和海防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 称“死要见尸”

1950 年 2 月 4 日晚 12 时，谷正文一行对吴石家进行突击搜查，谎称有人举报吴石是共产党。但搜查的结果一无所获。这时谷正文看了吴石夫人王碧奎一眼，发现她眼神有一丝慌乱，于是心生一计，称没有找到证据，但办案要有笔录程序，要麻烦夫人走一趟。

吴石思考良久，没有答复。然后对谷正文说：“我先上个厕所。”说完走到桌边，很隐蔽地将一个小瓶拿在手中，这是一瓶安眠药，吴石准备在厕所自杀。这个细节被发现后，谷正文心中一阵狂喜，终于可以确定吴石的身份，并及时制止了吴石的行动。

迫于无奈，吴石答应了谷正文的要求，同时叫了一名随身副官，与夫人一同前往。

车子行到一半，谷正文对吴石的随身副官说，到了。当其下车后，狡猾的谷正文立即加大油门，将吴夫人一个人带到南京东路的家中。他称吴石如果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老先生（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他，而她不是军人，如果担当一点责任，就说来找

“次长”接头的共产党是自己的远房亲戚，才能救吴石。并欺骗她说自己是吴石的部下，会在笔录上巧妙处理一下，算是报答“次长”的一种方式。就这样，吴夫人无意间透露了朱枫的名字。

1950 年 2 月 5 日晚上，谷正文再次来到吴石家中，称奉命传其谈话。吴石厉声怒斥并给周至柔打电话，然而，这个昔日的至交早已得到消息，拒接电话。谷正文在其寓所搜出吴石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为吴石“叛逆”定了罪。

蒋介石得知此案后，十分震怒。亲自下令枪毙吴石等人，并指定专人对行刑全程跟踪、拍照，以确保吴石的旧友与部下无法“掉包”，死要见尸。

1950 年 6 月 10 日，吴石在赴刑场前，留下“凭将一掷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的诗歌，表达自己甘为统一大业奉献自己生命的决心。在得知吴石等人遇害后，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挥笔写下了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春早。”（据中国军网、《湖南日报》）

“老黄牛”的抗战

在有关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中，常常可以看到在战斗危急时刻，重机枪手死守阵地，紧握机枪喷射出愤怒的火舌，扫向敌群。而其中常见的重机枪，就有大名鼎鼎的“老黄牛”马克沁重机枪。

抗战八年，它伴随抗日志士驰骋沙场，立功不小。



原装德国造马克沁重机枪。（资料图片）

和红缨枪，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天福山武装起义，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起义在胶东地区得到了热烈响应，短短几个月，文登、荣成、威海、蓬莱、牟平、海阳、黄县、福山、即墨等县（市）纷纷响应，武装起义反抗日本侵略的熊熊烈火呈燎原之势，胶东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胶东大地一片生机。然而，一个难题摆在了新组建的部队面前，那就是缺乏武器弹药。据起义战士回忆，没有子弹，他们就拿林秸棍儿塞进子弹带迷惑敌人、鼓舞群众，手榴弹也有不少受潮、不能使用的。筹集枪支弹药就成了起义队伍的一个重要任务。

1938 年 2 月，中共蓬莱县委组织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军。军阀吴佩孚家就在蓬莱城里。为了解决武器问题，起义部队找到了吴家。几经努力，部队从吴家得到长短枪一百多支，其中就有一挺“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

这挺重机枪全长 1197.55 毫米，枪身重 20 千克，枪架重 29 千克，口径为 7.90 毫米，采用水冷方式，以 250 发帆布弹带供弹，每分钟可射击 400—600 发子弹，表尺射程尖弹 2500 米，重尖弹 3500

米。之所以叫“二四式”，是因为 1934 年中国金陵兵工厂从德国引进马克沁机枪图纸，并于 1935 年即民国二十四年定型生产。得到这挺机枪，战士们如获至宝，手里终于有了像样的武器。因为这挺机枪火力压制时间长，威力大、可靠性高，枪身又呈铜黄色，战士们亲切地叫它“老黄牛”。

1939 年，“老黄牛”所在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十三团，成为八路军在胶东地区的主力部队之一。抗战期间，这挺“老黄牛”机枪与抗日救国军、八路军的指战员们一起参加战斗百余次，见证了大青阳阻击战、孙祖大捷、半壁山伏击战、日庄战斗、良蒙山战斗、郭家店战斗、蛇窝泊据点拔除战、马连庄战斗等一个个胜利，屡立战功、威名远播。

“老黄牛”也曾短暂离队。1940 年 12 月下旬，因遭汉奸地主告密，十三团团部在掖县上庄宿营时，突然遭遇日军包围。突围战斗中，我军损失惨重，重机枪手牺牲，“老黄牛”也被日军夺去。得知“老黄牛”落入敌手，本已冲出重围的团长李绍桥和政委苏晓风，立即组织队伍杀回村里，经过激烈战斗，把“老黄牛”抢了回来。不幸的是，

撤退途中团长李绍桥壮烈牺牲，年仅 30 岁；政委苏晓风重伤被俘，后被日军残酷杀害，年仅 25 岁。“老黄牛”归队后，十三团更加珍惜这挺以团长和政委的生命为代价夺回来的重机枪，像宝贝一样精心维护，让它在战场上大显身手。1942 年 3 月，“老黄牛”机枪随部队血战仰望顶，狠狠地打击了日军“打遍胶东无敌手”的疯狂气焰，粉碎了敌人的拉网扫荡，鼓舞了胶东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胶东人民将“老黄牛”编进歌曲传颂：“胶东有个十三团，作战真勇敢，仰望顶一场血战……老黄牛咕地叫，冲击炮轰轰地炸……打死打伤日，伪军三百三十三，击毙大岛鬼子回家上西天……”就这样，“老黄牛”与战友们拔据堡、夺据点、杀鬼子、除汉奸，十三团“老虎团”之名威震胶东，“老黄牛”的名声也随之流传。

解放战争中，“老黄牛”所在部队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等战斗，解放济南时率先把红旗插上城头，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的光荣称号。1958 年，这挺功勋卓著的“老黄牛”机枪光荣退役，从部队来到博物馆，向观众讲述抗战故事。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拾遗

红军干部团——长征中的“流动学校”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出发前夕，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中革军委决定将 1933 年 10 月 17 日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出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再次合并，组成干部团，并恢复工农红军学校建制。干部团由陈唐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具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干部团辖 3 个步兵营、1 个特科营、1 个上级干部队，共 1400 余人。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随时参加战斗。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干部团多是精兵强将且装备优良，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和缴获的钢盔。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经常出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

遇河架桥，争当开路先锋。长征出发伊始，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就受领在于都河上架设两座浮桥的任务。他们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使红军 4 路纵队稳步从桥上通过。

英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在遵义会议上恢复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随即指挥四渡赤水。其间，干部团配合主力部队参与战斗。

1935 年 1 月 28 日，中央红军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城枫村坝、青杠坡遭遇敌军，红三、红五军团率先投入战斗。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红军陷入困境，毛泽东急令干部团前往支援。陈唐率干部团英勇反击，有力打击了敌人。土城战斗后的第二天，干部团又配合主力部队投入一渡赤水的战斗并重创敌人。

2 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准备拿下娄山关，再占遵义。彭德怀在前线指挥作战，令干部团急行军一天走 120 余里，由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接替兄弟部队扼守娄山关，其余赶赴遵义城外夺取老鸦山。老鸦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谁能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经过苦战，干部团配合红三军团第 10 团胜利攻占老鸦山，使红军再占遵义城。此役，红军共歼敌两个师又 8 个团，俘虏敌人 30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振奋了全军士气。

四渡赤水后，红军进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入川。5 月 2 日，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赶在 4 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干部团以第三营为先遣营，以两个步兵营、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为后梯队。为出其不意，杀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翻山越岭，一昼夜急行 160 余里，迅速占领皎平渡南岸，悄悄渡过江抢占北岸制高点，俘敌 1 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并控制渡口。而后，干部团乘胜攻占通安州，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以 7 只小木船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此，中革军委通令嘉奖干部团。

边战边学，提高战术水平。长征中的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干部的流动学校，始终坚持且走且教、边战边学。干部团一日行军百里，跋山涉水，不忘教学本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利用行营、休息、站岗及战斗间隙，采取集体教学、个别辅导、三五成群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战术技术、研究战例、总结战斗经验，先后组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破袭等战法的研究训练。教员会结合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学员在热烈的讨论中交流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同时活跃了行军气氛，驱散了行军的疲劳。

1935 年 9 月中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团与红一军教导营合并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11 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随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与西北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会合，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至此，干部团的历史使命结束。（据《学习时报》）

溯源

“哥”之称呼唐宋皇家有分别

“哥”是一个非常普通常见的字，一般情况下和“兄”意义相同，指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或同族同辈中年齡比自己大的男子。如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伏维哥哥友慈惠，和易谦恭。”但在唐、宋皇家里，“哥”的称呼却别具一格，用法各有不同。

顾炎武《日知录》：“唐时人称父为哥。《旧唐书·王琬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谥传》：惟三哥罹其罪。玄宗行三故也。”顾炎武举的两个称父为“哥”的例子其实都只在李唐皇家，并非唐时人都如此，比如白居易的“哥”就是普通的“兄”。即使在李唐皇家，“哥”也常常即是“兄”。《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年》：“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岁时，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饈，元名保傅等谓元名曰：‘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太宗闻而壮之，曰：‘此真我弟也。’”李元名就叫同父异母的唐太宗李世民（李渊第二子）“二哥”，李世民称其为弟，兄弟二人“哥弟”相称。又如《旧唐书·睿宗诸子》记载，唐玄宗隆基的大哥唐睿宗长子李宪（成器）薨后，唐玄宗的御制悼文写道：“一代兄弟，一朝存殁，家人之礼，是用申情，兴言感恩，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俦，尝号五王，同开邸第。”也是哥弟、兄弟通称。可见，在李唐皇家的称呼体系里，“哥”可以用来称呼父亲，也可以用来称呼兄长。

有趣的是，在赵宋皇家的称呼体系里，“哥”并不用来称比自己辈分长的父、年龄长的兄，而是用来称呼子弟辈或同辈的弟弟。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孝宗恢复”条：“上每侍光尧，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至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吴云壑”条：“宪圣既御帘政，则戒公曰：‘垂帘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时（原注：谓孝宗）。汝辈自此少出入，庶免干预内廷之谤。’其严侍家人如此。”“陆石室”条：“太上读数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归当语大哥（原注：孝宗）。’宪圣从旁赞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隐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职做甚？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却是害他。’”宋高宗退位后，宋孝宗给高宗上尊号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宪圣指宋高宗宪圣烈皇后吴氏。宋高宗没有子嗣，宋孝宗过继后，已是赵构和吴氏的继子，但两人却叫宋孝宗为“大哥”。但不宋高宗夫妇称儿媳的宋孝宗为“哥”，韦太后也是如此。《四朝闻见录》“柔福帝姬”条：“及韦太后归自北方，持高宗袂泣良久，遽曰：‘哥被番人笑说，错买了颜子帝姬。’”韦太后是宋高宗的母亲，其称自己的亲生儿子亦为“哥”。《宋稗类钞》：“绍兴和议成，乙亥太后将还。钦宗挽其裾曰：‘寄语九哥。’绍兴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根据《宋史·宗室列传》记载，宋徽宗有 31 子，宋钦宗最长，宋高宗排行第九，作为大哥的宋钦宗却叫九弟赵构为“九哥”。

可见，李唐皇室子弟一般用“哥”来称呼父、兄；而赵宋皇家则恰恰相反，“哥”往往是父（母）、兄对子、弟的亲切叫法，二者用法有着较大的差别。（据《联谊报》）